



泰华山下,市上坪一隅

泰华山下市上坪:湘赣褶皱里的家国往事

刘正平

这是一趟迟到的寻访。2022年,县地方志研究室启动了《攸县农业合作化》一书的编纂工作。在那份沉甸甸的编写提纲里,市上坪的“刘长庚互助组”被列为重中之重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这个名字曾是全国乃至全国的一面旗帜。领导在派我去市上坪搜集资料时反复叮嘱:“这是全书的压舱石,你要顺着藤摸瓜,把那些沉在岁月河床里的细枝末节、前因后果,都给我挖出来。”

秘境泰华山

市上坪偏远,它蜷缩在攸县的东北角,背靠泰华山,与江西萍乡市东桥镇厚田村、醴陵船湾镇新桥村芥江于此,是真正的“鸡鸣闻三县”之地。同治版《攸县志》载:“泰华山,在北乡,县北一百二十里,萍乡、醴陵三邑界,周围十余里。”寥寥数语,勾勒了它的险远。泰华山是县内名山,老辈人口中常念叨这里有奇景:石笋参天、天螺晒匾、三拜拜佛、四虎吼羊、五马奔槽……几十年间,我走遍了全县的乡镇,唯独独漏了这个奇闻。此次公干,也算是一偿夙愿。从皇图岭沿106国道北上,折入深山,二十余里的盘山路像一条灰色的带子,在丛林峻岭间缠绕。车行许久,视野里皆是苍翠,正当人疲腿酸有些困顿,眼前豁然开朗——柳暗花明处,市上坪到了。前方是一个长长的缓坡,街道宽阔,两侧楼房梯次排布。这里曾是规划中的开发区,略显冷清,但顺坡而下,老街的烟火气便扑面而来。恰逢墟日,并不算宽窄的街道被挤得水泄不通。街道两旁店铺林立,人声鼎沸,这里聚集着湘赣两省多县的赶集人。耳边是叽叽呱呱的各式方言,乍一听仿佛来到了异域。市上坪人有着惊人的语言天赋,攸县话、醴陵腔、萍乡调随意切换,见人下菜碟,毫无违和感。店铺里的货物也透着明显的“边界混血”特征:这边的铺子摆着醴陵的陶瓷、烟花、酱板鸭、炒糕酥;那边的铺子则堆满了萍乡的莲蓬老酒、擦菜、麻辣鱼、盐果子、需要袖和紫红米。这种跨越行政区划的聚集,让人瞬间明白,为何这里自古便是商贾云集的重镇。

从“望东”到“市上坪”

若要读懂七十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,必先读懂这块土地的基因。市上坪的历史,远比我想象的厚重。已故乡土学者欧家伙先生曾写过一本《望东乡土志》。书中阐述,市上坪古称“望东乡”,文字记载可追溯到明永乐年间。明代举人颜龙洲晚年从江西永新迁居于此,自号“望东居士”;上坪生人江履高攀附近的稼田,筑庐“望东邑庄”。清初依巴举人贺志庵身过此地,更是留下了“江声流向北,山市面南来。柳岸摇新绿,浪花缀小红”的佳句。而“市上坪”这个名字的由来,更充满了乡野的豪气与商业的精明。光绪二十一年(1895),地方人士刘锡铭、刘文亮等六人合伙,在西边山坡的大坪里开辟米谷、牲畜、竹木市场。他们签下契约,每年向县衙交牙税银150两。因这块坪地极大,足不出户的乡里人自诩这是“世上第一大坪”,口头称“世上坪”。后来六位合伙人为了体现墟场内涵,在招牌匾额和文书中雅化为“市上坪”,沿袭至今。清末民初,凭借水运之利,市上坪迅速崛起。从鹏江桥码头下河,大宗谷米、竹木、炭、棉麻、生猪、药材、生姜、辣椒直销醴陵、长沙乃至汉口。湘赣两省的商户纷至沓来。鼎盛时期,一块块青石铺就的石块路和一级级花岗岩台阶垒砌的台阶,组成了一座拥有“三巷、四槽、五片街”的庞大商埠。酒肆、南货行、茶楼、钱庄、药铺、染铺、布店应有尽有。其中规模最大的,当属江西人最德钦的“吉泰昌”和陈庆发的“远志堂”商行,他们开行了多家分号,涉足多个行业,俨然是当年的商业巨头。

正是这种见过世面、敢闯敢试的商业传统,孕育了市上坪人敢为人先的性格。这也不难解释,为何在20世纪50年代,这里能诞生全国闻名的农业互助典型。

合作社旧事

农业合作化运动已是七十年的旧事了,当年的亲历者若在世,怕是已近期颐之年。我在喧嚣的人流中试图寻找当年的亲历者,但时光无情,刘长庚夫妇已归道山,后人亦散落四方。几经辗转,我叩开了84岁老教师陈松祥的家门。陈老清瘦硬朗,依然保持着读书人的儒雅。提起往事,他记忆的闸门缓缓打开。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。1952年,市上坪村老屋组人刘长庚牵头成立互

助组;次年2月,他又以惊人的魄力,说服并发动周边大屋场、葛蒲塘、麻城等地的四个互助组,合并成立了攸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——刘长庚农业社。这个创举惊动了上层。时任湘潭专区专员的华国锋,曾亲自来到这个深山里的先进社蹲点。1954年,湘潭地区各县区主要负责人会议更是直接开到了刘长庚农业社,华国锋在会上作了《当前形势和今后农业合作社发展的几个问题》的重要报告。可以说,刘长庚的经验,是攸县乃至全省农业合作化的“火种”。

最传奇的故事,发生在1955年。那年春,刘长庚赴京参加全国农业合作化先进代表大会。会议期间,时任铁道兵副司令员的开国少将刘克——这位从市上坪走出去的将军,接见了乡亲们。为了支持家乡农业生产,将军大手一挥,赠送给刘长庚农业社一辆解放牌汽车。

消息传来,全县轰动。然而,现实却给激情泼了一盆冷水。当时的公路只通到皇图岭,剩下二十多里是羊肠小道,汽车根本进不来。无奈之下,这辆代表着工业文明的汽车,被置换成了10匹高大威猛的棕色军马。军马进村,那是轰动十里八乡的大新闻,社里立即安排专人喂马,但成了个技术活——军马娇贵,对饲料挑剔,习惯吃麦麸,社里只好托人去攸县大米厂找米皮糠。

更麻烦的是肥料。当时正值春耕抽穗,急需壮籽肥。那时没有化肥,聪明的社员们想到了老办法:剥下老房屋墙上的土砖。老墙土含有丰富的硝酸钾(火硝),是极好的钾肥。大伙儿把土砖捣成粉末,装在箩筐里,用这10匹马驮着运送到田边,撒在禾行间。

然而,北方的马终究适应不了南方的田。田间小道又窄又松软,高大的军马蹄子常常陷入泥淖中提不出腿,马蹄很快也就松动、脱落。攸县没有养马的传统,县域内根本找不到会钉马掌的师傅,脱落了蹄铁的马蹄寸步难行,竟成了“只能看不能用”的累赘。这段略带黑色幽默的往事,直到1958年才画上句号。东风人民公社成立后,市上坪成为下属生产大队,军马转送给公社。公社特意从河南请来师傅,在皇图岭镇上开设了钉马掌的作坊,又打造了几辆马车,专门沿着醴攸公路(今106国道)运送货物,这批军马才算真正派上了用场。

血色与荣光

站在陈松祥老人的屋前回望,泰华山静默无言。这片土地不仅盛产稻米和茶叶,更盛产热血。翻开革命史册,市上坪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鲜血。1927年,市上坪成立攸县第十三乡农民协会,成为攸北农民暴动的策源地。马日事变后,白色恐怖笼罩,但无数市上坪子弟毅然参加湘赣红军。在这份沉甸甸的名单里,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悲壮的历史。冯雪山,莲花县赤卫队一排通讯员,被国民党义勇队杀害于攸县柏树坞公墓;汤喜洋,游击队通讯员,1927年在柏树下牺牲;刘观云,区苏维埃工作人员,1928年在萍乡下埠作战牺牲;张友生,红军某部副连长,1931年在江西永新牺牲;颜喜七,赤卫队员,1931年在莲花牺牲;丁治平,红军某部副连长,1935年在长征途中牺牲;管关五,湘南游击队联络员,1935年在攸县寒寨惨遭杀害。

抗战时期,市上坪的硬骨头依然铮铮作响。1944年衡阳保卫战,热血青年贺福泰、贺福润兄弟,在衡阳潭家山阵地(今祁东县白地市镇)坚守七天七夜,双双阵亡。至今,衡阳抗日将士纪念碑上仍刻有他们的英名。还有刘石荣,那是倒在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战士。

当然,还有那位赠送汽车的刘克将军(1915—2000)。他原名刘相尧,是市上坪村湖背组人。从武汉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才子,到延安抗大的学员,从汉沈、平津战役的硝烟,到抗美援朝不断的“钢铁运输线”,他身经百战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他又亲自规划指挥了黎湛、鹰厦、外福、包兰等多条铁路干线。1961年晋升少将,官至铁道兵团副司令员。但他始终没忘记那个养育他的小山村,那辆没能开进村的解放牌汽车,便是他对故土最深情的眷恋。

临别时,墟场的人群已逐渐散去。回望市上坪,新楼与旧屋交错,喧嚣与静谧并存。那个“农业合作化旗帜”的时代虽然远去,但那种敢于在这个山乡里开辟“世上第一大坪”的心气,那种家国相连的深情,依然像泰华山的青松一样,扎根在湘赣交界的风烟里。



横卧在湘江渡口段江心的挽洲岛

文旅株洲

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、株洲日报合办

挽洲岛记

贺志伟

岛不大。晨雾在江鸥的翅膀下流转,挽洲岛如一片青螺,静卧于湘江渡口段中央。它地处株洲市渌口区龙船镇,北望株洲,南接衡东,恰在两地之间,自成一叶水上桃源。洲头新设的网红打卡地,立着一面精致的木牌,上书:“风里雨里,我在挽洲等你”。这行字,像是整个岛屿对游人的温柔诺言。绕岛步行不过个把时辰,江风总伴随着脚步,时而掀动衣角,时而将渔歌揉碎了撒满滩涂。东岸的芦苇荡接天连江,一位正在写生的画家转过头,笑着对我说:“感觉我在挽洲岛承包了整个芦苇荡。”秋风一起,万顷芦花便化作漫天飞雪。洲岛中央,一片苍郁的松林悄然伫立。林间古樟成群,那据说说是唐时杜甫系舟的千年古樟尤显巍峨,枝叶如盖,深深扎进岛屿的记忆里。

岛很老。旧名“挽洲”,暗藏“挽手一生,风雨同舟”的古老祝福。唐大历四年春,杜甫扁舟南下,夜泊于此。但见“参错石云稠,坡陀风涛壮”,江风寂寥,渔火明灭。翌日破晓,雾散开,眼前竟是“晚洲迤知名,秀色固异状”的奇景。舟行江上,有“棹经垂绿把,身在度鸟上”之趣;泊岸小憩,得“摆浪散帙妨,危沙折花当”之闲。这片江洲以它的灵秀,抚摸着诗人漂泊的心,一首《次晚洲》遂在桨声欸乃中吟成。这羁旅之叹与山水之秀,都封存在那圈已逾一千二百六十年的年轮里。

岛也新。新世纪的江风为挽洲拂去尘霜。2013年湘江株洲段划为永久禁采区后,洲岛换来了更清澈的江流与更葱郁的生态。昔日寒门学子读书处,一座现代图书馆拔地而起;旧时纤夫踏出的野径,已化作彩虹步道。年轻人带着新知归来,在抖音直播间里,将青椒、薄皮香玉甜瓜推介给全国;将草龙编织技艺开发成文创,把杜甫诗境烧制成陶器。传统,在旅游的热潮中获得了新的呼吸。

我登岛时正值初冬。洲头的千年古樟下,写生的学生正用油彩捕捉江霞;南岸的露营地里,青年夫妇带着孩子用滩涂软泥制陶,说要烧制一只“会记住江声的陶瓮”。信步于红瓦白墙的民居之间,但见庭前院后

开,眼前竟是“晚洲迤知名,秀色固异状”的奇景。舟行江上,有“棹经垂绿把,身在度鸟上”之趣;泊岸小憩,得“摆浪散帙妨,危沙折花当”之闲。这片江洲以它的灵秀,抚摸着诗人漂泊的心,一首《次晚洲》遂在桨声欸乃中吟成。这羁旅之叹与山水之秀,都封存在那圈已逾一千二百六十年的年轮里。

岛也新。新世纪的江风为挽洲拂去尘霜。2013年湘江株洲段划为永久禁采区后,洲岛换来了更清澈的江流与更葱郁的生态。昔日寒门学子读书处,一座现代图书馆拔地而起;旧时纤夫踏出的野径,已化作彩虹步道。年轻人带着新知归来,在抖音直播间里,将青椒、薄皮香玉甜瓜推介给全国;将草龙编织技艺开发成文创,把杜甫诗境烧制成陶器。传统,在旅游的热潮中获得了新的呼吸。

我登岛时正值初冬。洲头的千年古樟下,写生的学生正用油彩捕捉江霞;南岸的露营地里,青年夫妇带着孩子用滩涂软泥制陶,说要烧制一只“会记住江声的陶瓮”。信步于红瓦白墙的民居之间,但见庭前院后

株洲文脉

绿水长流见风骨——刘谦与民国版《醴陵县志》

邬添奇

在湖南方志的宏大版图中,刘谦主编的民国版《醴陵县志》如同一座巍峨的丰碑,屹立于战火纷飞的二十世纪40年代。翻开这部厚重的县志,不仅能读懂醴陵的历史,更能读懂刘谦这位修志者的精神底色。刘谦,字约真,号无诤居士,1883年7月20日出生于醴陵冯山镇(原大林乡大林村)。我在梳理其人生轨迹时发现,刘谦的一生,是对醴陵人“义善精神”最生动的注解。

从涪江书院到武昌城头

刘谦之“义”,首先体现于情。这一点,在他与近代民主革命英雄宁太一的生死之交中,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二人同为醴陵人,皆出于涪江书院门下,是同年、同乡、亦是同窗。然而这段情谊的建立并非偶然。刘谦居大林,宁太一居东富,两地相隔,在入院前恐无深交。细考时间轴,刘谦于1900年入学涪江书院,宁太一则于1903年考入长沙明德学堂。这意味着,二人的同窗之谊虽不满三载,却因志同道合而相交莫逆。

从1903年宁太一负笈长沙,到1913年喋血武昌,这十年间,刘谦虽未时刻处于革命风暴的中心,却始终是最坚定的后盾。这份情谊,在宁太一掌拳的两个关键节点上,化作了具体的行动。

其一是宁太一深陷囹圄的“狱中三年”(1907—1909)。彼时,刘谦受挚友之托,与同乡李隆建在险境中重建同盟会湖南支部,联络同乡,吸纳新血,更为感人的是他展开的一场特殊的“精神营救”。每个周日,刘谦都会奔波于图书馆与监狱之间,搜罗书籍递进铁窗,若图书馆无书,便向私人藏家搜求。据统计,宁太一在狱中博览群书两千余册,据此就意味,在近千个日夜里,刘谦平均每天都要为挚友寻觅并送去两本书。这份坚持,是对友情的忠诚,更是对革命火种的呵护。

其二是1913年宁太一遇刺牺牲。噩耗传来,刘谦悲愤交加,当即从长沙奔赴武昌。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,他克服重重险阻,终于将挚友灵柩护送回乡,安葬于醴陵西山。此后,他又与傅熊湘呕心沥血,将宁太一遗作与柳亚子辑录的文稿合刊为《太一遗书》,四处奔走谋求出版,只为让英烈精神得以传世。

这份义气,刘谦不仅给了宁太一。在动荡的时局中,他积极安置马日事变后逃至长沙的醴陵农运负责人李人社;他避奔斧钺,营救身陷囹圄的水口山煤矿铁路司机游采臣;他支持同乡好友傅熊湘的事业,并在得去世后为其整理编辑《钝安遗集》。甚至在晚年编修县志时,他力排众议,特地为醴陵籍中共将领左权立传。在他心中,党派之争终究有尽时,但追求正义与进步却是矢志不渝的信念。凡此种种,皆可见其重情重义、甘效犬马,颇有古烈士之风。

乱世中的慈悲与担当

刘谦之“仁”,在于他对生命的敬畏与对

苍生的悲悯。1918年3月,北洋军阀张敬尧祸乱湖南,不仅查封了《长沙日报》,更纵火焚馆,更下令全省通缉报社同仁。作为报社的一员,刘谦在千钧一发之际,从报社窗户跳入后院脱险。然而,逃出生天的他并未独自苟活,而是连夜潜回醴陵,组织受牵连的亲族避难萍乡。这种在危难时刻首先以自身庇护亲族的担当,正是仁者的本能。

抗战胜利后,寓居长沙的刘谦,目光更加深远。他积极参与程潜、陈明仁的和平起义筹备,多次参与秘密会谈,并参与营救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。

晚年的刘谦,洗尽铅华,精研中医。对于贫病乡民,他不仅施医赠药,更分文不取,他敏锐地发现,民间因旧法接生导致的恶性悲剧频发,深感普及科学之紧迫,于是亲撰《胎产常识》一书,自费刊印千册,分发给穷苦人家。这一本薄薄的小册子,救活了无数母婴,也映照出一位乡贤“善而仁”的温热心肠。

只有文章传不朽

正是这样一位义于情、善而仁的长者,在1941年冬,以五十八岁之躯,挑起了一副沉甸甸的担子——重修《醴陵县志》。

此时修志,谈何容易?首先是时机之“不合时宜”。1941年的中国,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,湖南更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战场。当此国难当头,为何要修志?其实,这项工程的动议最早可追溯到1936年,时任醴陵县长贺笠青召集乡绅,继续修志。遗憾的是,随着贺县长去任及抗战全面爆发,工作被迫搁置。但醴陵的文化血脉并未因此中断,县中热心文献的人士,仍私下秉承糞草笔,记录着时代的点点滴滴。

其次是心境之“反差”。年轻时的刘谦,曾为革命奔走呼号。然而,随着宁太一、傅熊湘等好友的相继离世,目睹军阀混战、外敌入侵,在省府教育、民政战线躬耕半世的刘谦,心境渐生变化。他虽未再冲锋于革命一线,却选择了一条更为寂寞坚韧的道路——在后方守护文脉。他筹办小学、积谷备灾、襄助开明中学(今醴陵市二中),直至牵头修志。他深知,山河破碎之际,保存一方史料,便是保存了民族复兴的火种。

这部县志,从最初动议到最后付梓,整整耗时十二年。时任省文献委员会主任贺笠青在序言中写道:“不顾时之危厄,事之艰苦,欲举而措之,待观其成,闻者愕然而滋惑。”在那个“偌大中国放不下一张书桌”的年代,湖南全省79个县市仅有29个完成修志,而《醴陵县志》因体例严谨、立类新颖、材料详实,被誉为“民国湖南县志之圭臬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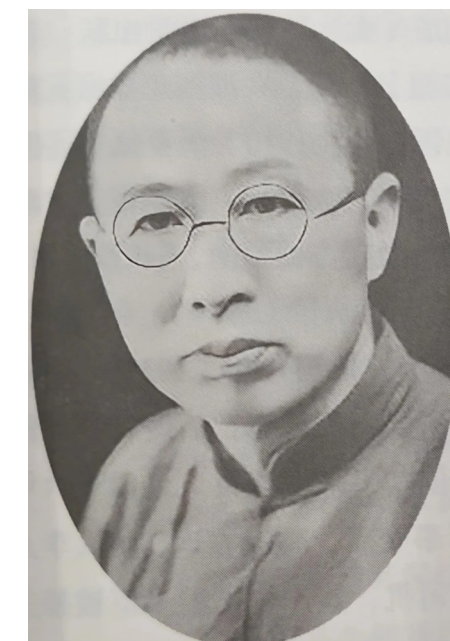
这“圭臬”二字背后,是刘谦及其团队克服的“五难”:一难在史料稀缺。康熙以前的旧志已不可复得,即便同治版县志也难以购全,这让参照旧志如同盲人摸象。

尽是绕岛图景:屋檐下挂满红柿,竹篱上垂着黄瓜,菜畦里卧着甜瓜,路旁的棉花絮然绽放,与窗前的月季相映成趣。

暮色渐浓时,我循着鼓声走到洲心广场,但见十余名身着靛蓝布衣的汉子,正舞动一条十八节草龙——这是延续三百年的醴洲雄戏《神龙踏浪》。龙首老伯卸下面具擦汗时告诉我:“去年抖音有人拍了咱们的龙,现在外地娃娃都来学哩。镇上教我们把草龙编小,做成纪念品,销路不错!”

夜宿岛西民宿,推窗见江船灯火如串珠逃逸。主人抱来自酿的米酒,说起即将举办的“醴洲文化节”;要让“醴洲银鱼”装上电商翅膀,还要举办星空诗会。微醺间,我忽然顿悟:这座江心小岛,从未与世隔绝,它只是在以另一种方式,与时代同频共振。

临别晨光里,渡口石阶旁新立了一块青石碑。上前细看,正面刻着杜甫《次晚洲》中的名句,背面则是当代岛民的自撰注脚:“挽洲不必挽流光,且看新潮逐旧浪。”江风拂过,碑旁丛生的野菊花领首轻摇,仿佛千年来守望的岛民,始终面向奔涌的时代。



刘谦像

二难在经费枯竭。战时军事开支浩大,兵燹之后百废待兴,修志经费捉襟见肘,全凭刘谦等人多方筹措。

三难在环境险恶。修志期间,日寇铁蹄蹂躏醴陵长达十五个月,纵横蹂躏。刘谦团队不得不推着独轮车,将珍贵的书稿运往深山藏匿,待寇退后再搬回整理,如此反复,书稿竟未遗失。

四难在统计草创。尽管团队深入实地勘察,但当时政府统计调查制度属草创,数据经纬之间难免偏差,需耗费大量精力甄别核准。

五难在人事代谢。从贺笠青发起,到团队成员几经变动,有的调任,有的辞职,有的甚至在战乱中辞世。各项任务的交接频频脱节,全赖刘谦一人居中调度,缝合断层。

贺笠青在1948年审稿后感叹:“约真以垂老之年,孜孜于志,乘之搜采编述,发凡起例,董而理之。山陬水澁之踪,杜户操觚之业,始事于乱中,定稿于寇退,可谓勤矣。”这段文字,是对刘谦最好的致敬。

2023年11月,当我再次翻开这部在此刻显得格外沉甸甸的《醴陵县志》,读到这篇序言时,心情久久难以平静。透过泛黄的纸页,我仿佛看到了八十多年前那个在油灯下、在防空洞旁孜孜不倦的身影。那一刻,我合上书页,在心里向刘谦先生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
yzhy83@163.com

广告接待热线

288835396